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丛·书

中国农民工的 政治经济学考察

杨思远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丛·书

中国农民工的 政治经济学考察

杨思远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学考察/杨思远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 7

ISBN 7-5017-7072-7

I. 中... II. 杨... III. 农民—劳动就业—研究—中国
IV. D66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4432 号

中国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作 者: 杨思远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100037 ·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网 址: 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 余静宜 (010-68359421, Email: jingyi_v@126.com)

责任印制: 张江虹

封面设计: 红色方块艺术设计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北京市地矿印刷厂

开 本: A5 1/32

印 张: 13.5

字 数: 354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7-7072-7/F · 5671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8359418 68319282

服务热线: 68344225 68353507 68341876 68341879 68353624

序

吃穿住行用，是每个人都离不开的。今天中国人的这五项，几乎都是由被称为“农民工”的特殊群体提供的。餐馆的厨师和服务员是他们，服装厂、鞋厂、袜厂的工人是他们，建筑公司的工人是他们，筑路和修路的工人是他们，多种用品生产厂和商店的工人也是他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农民工，就不会有现在的生活。

然而，“农民工”却没有与其作用相当的社会地位。从户籍说，他们的身份是农民，而从职业讲，他们又是工人。在城里工作，家却在农村。他们修建的平坦大路和高楼广厦不归他们行走和居住；他们做的高档电器、家具、服装、菜肴，不归他们享用。他们每天十几个小时的辛劳创造的剩余价值，使成千上万个“包工头”、“企业家”、“洋老板”富了起来，而自己每月所挣的几百元的工钱却只够维持生命——就是这区区几百元，还要被长期拖欠，甚至得不到。农民工，这个特殊的阶级，支撑着现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每年国内生产总值所增长的百分之八或九，其中四或五都是他们以辛勤劳作贡献的。

农民工是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主力，他们身上，体现着文明的进步，他们的双手，塑造着新的文明和新的人生。每当春节过后，举国“民工潮”的涌动，促成了中华民族的进步，正是从这些背井离乡的“打工仔”、“打工妹”身上，我看到了民族兴盛的希望。

农民工的准确数量，很难从官方统计资料显示出来，据本书作者的估算，大约在2.1亿左右。因农民工流动性、季节性大，我估计多时会达2.5亿，加上其家庭人口，农民工关乎着中国三分之一人口的生计。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自觉的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转变的人群，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主力军之一。

近年，对农民工的关注多了起来，但大都集中在他们的生存条件

和工作环境上，特别是从道义上为他们争利益。这些都是应该的，但不够。思远读博士期间，专注此课题，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农民工进行系统考察，虽不完满，却已开端。此文由他博士论文加工而成，论及农民、农民向农民工转化、农民工的构成、农民工的收入、农民工的经济作用与再生产新图式、农民工引起的阶级分化、农民工的阶级意识及农民工的历史地位。这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新课题、新范畴。而从政治经济学对农民工的考察，亦使农民工问题得以上升为理论，对今后的研究和政策制订，都是必需的前导。

此题新作，大有可挖掘、抽象、论证之处。深入探讨，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意义尤为重要，冀思远进一步为之。

翁永信

2005年6月26日

目 录

导 论	(1)
-----------	-----

第一章 农民

一、劳动与劳动者的历史发展	(34)
二、农民的素质技能：农业生产者	(41)
三、农民的社会地位：集权官僚制统治下的小农经济 主体	(54)
四、农民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社会阶级	(60)
五、新中国的农民	(67)
六、农民是农业生产者与农民户籍身份的统一	(80)

第二章 农民工

一、农民工职业与身份分离的原因	(82)
二、农民工获得非身份职业的条件	(96)
三、户籍身份的世袭性与农民工的产生	(106)

第三章 在乡农民工

一、在乡农民工与进城农民工是农民工的两种存在 形式	(123)
二、乡镇企业与在乡农民工	(125)
三、在乡农民工的双重就业形态	(135)
四、在乡农民工的农业收入与工资收入	(142)
五、乡镇企业的改革与在乡农民工增速的减慢	(149)

第四章 进城农民工

- 一、从在乡农民工到进城农民工 (158)
- 二、生产绝对剩余价值 (174)
- 三、进城农民工的廉价工资 (183)
- 四、进城农民工与中国城市化 (205)

第五章 二重收入

- 一、考察农民工的收入应以户为单位 (211)
- 二、农民工的农业收入 (214)
- 三、农民工的工资收入 (222)
- 四、二重收入的辩证法 (226)
- 五、二重收入与农村的稳定 (234)
- 六、二重收入与资本增值 (240)

第六章 农民工的经济作用与再生产新图式

- 一、再生产图式：阶级之间的经济依存关系 (245)
- 二、工业与农业两部门再生产图式 (254)
- 三、三部门简单再生产新图式 (275)
- 四、三部门扩大再生产新图式 (286)

第七章 农民工与阶级分化

- 一、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阶级 (298)
- 二、农民工与农民阶级的分化 (302)
- 三、农民工与中国无产阶级的二重化 (318)
- 四、农民工阶级与私有企业主阶级 (327)
- 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冲突阶级间的根本一致的
 利益 (332)

第八章 农民工的阶级意识

- 一、小农意识 (341)
- 二、小农意识在农民工身上的遗存 (350)
- 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及其作用 (357)
- 四、农民工阶级意识的形成 (364)

第九章 末代农民

- 一、农民工是中国农民向工人发展的独特形式 (374)
- 二、“民工荒”——农民工对资本特有的罢工
方式 (383)
- 三、农民工是一个过渡性阶级 (398)

参考文献 (407)

后 记 (420)

导 论

—

农民工是指拥有农业户口但离开土地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雇佣劳动者。从职业身份上说,农民工已经是工人,但从户籍身份上说,农民工仍然是农民。

农民工可以分为“离土不离乡”——主要受雇于乡镇企业的在乡农民工和“离土又离乡”——主要受雇城市企事业单位和从事个体经济活动的进城农民工。目前,我国这两类农民工的数量大约在2.1亿以上,通常人们所说的农民工主要是指进城农民工,2003年进城农民工人数大约在9900万。^①本书研究的范围包括这两类农民工。

世界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一个普遍规律。但是各国劳动者实现这一发展所采取的具体形式是不同的:英国是流民、美国是移民、俄国是解放农奴、日本是兼业农民和通勤农民、拉美是城市贫民,在中国就是农民工。各国劳动者的发展在从农奴或农民向雇佣工人转变过程之所以采取了不同的经济形式,是由各国特殊的经济条件决定的。因而通过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不同形式的分析,能够透视各国经济关系的特殊性和劳动者发展的特殊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调动了农民增产的积极性,在连续几年获得农业丰收和出现农

^① 项开来:《农民工的过渡性》,载《经济日报》2004年9月20日,第9版。

村自由劳动力的基础上,加之长期执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政策给消费品工业发展预留的市场空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产生了在乡农民工。到20世纪90年代,在乡农民工已成为我国农业劳动者从农民向产业工人转变的主要过渡形式。三年治理整顿时期受宏观紧缩政策的影响,乡镇企业发展遇到困难,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乡镇企业资本增密,能够吸纳在乡农民工就业的速度大为趋缓。与此同时,由于户籍制度的松弛,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受到鼓励,产生了进城农民工。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粮价下跌和农业经营收入的降低,进城农民工迅速增长,每年以千万人数递增,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民工潮”。

农民工的产生和迅猛发展,对农村经济的繁荣和沟通城乡关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劳动者向现代产业工人转变的过渡形式,对于增加农民收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大多数在乡农民工仍然耕种一部分土地,并以从乡镇企业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在乡农民工亦工亦农的双重就业带来了农业经营收入和工资收入的双重收入。农业经营收入的存在使得在乡农民工廉价工资成为可能,这种廉价工资成了乡镇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堪与实力雄厚的城市企业一较高下的秘密武器。要认识乡镇企业的竞争力,不研究在乡农民工是根本不行的。

进城农民工同样拥有小块土地使用权,但本人不从事耕种,而由家人代耕或转包他人。进城农民工在沿海发达地区主要接受私有资本、国有资本和外国资本雇佣。资本对进城农民工的掠夺式使用,使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成为主要形式。廉价工资和延长工作日、恶劣的劳动环境和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已经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和同情,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农民工的廉价工资不包括繁衍后代所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和劳动力教育培训费用,只包括养活劳动力自身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这种廉价工资尽管很低,但是对于农业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的农

民工家庭来说,是实现增收的主要渠道,也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础。另一方面,农业收入的存在使廉价工资长期维持成为可能,农民工的二重收入相互影响。廉价工资使资本对农民工劳动力趋之若鹜。私人资本以农民工廉价工资为杀手锏,同国有资本和外国资本展开竞争,积累了巨额财富;国有资本毫不退让,迅速实现从“减员增效”向“换员增效”的转变,以廉价农民工替代城市正式职工;国际资本同样对廉价农民工甚为垂涎,通过产业布局调整,将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部件生产转移到中国东南沿海,农民工便成为“世界工厂”的职工。珠三角、长三角、闽东南地区的繁荣是建立在农民工的血汗劳动基础上的,能否使经济繁荣为农民工所共享,关系到以廉价劳动力为竞争优势的中国经济繁荣的久暂。

农民工劳动力商品化,推动了劳动产品商品化进程。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和汇回款拓展了农村市场。农民工的经济作用在于创建了一个新的产业部门,即以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为主体的工业部门,实现了国民经济结构的三元化,改变了中国经济流程图,绘制了一张新的社会再生产的经济表。这个新出现的部门不仅受整个宏观经济的制约,也会深刻影响到宏观经济的运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已经不可能不考虑到农民工的巨大作用了。

农民工的出现使中国劳动阶级发生了新的分化。在农村是农民阶级与农民工阶级的分化,这对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影响极为深远,标志着中国农民作为一个没落阶级终于走到了尽头。在城市,以农民工为新式工人阶级,同城市传统工人阶级发生了分化,工人阶级队伍二重化了。工人阶级的这两个部分在众多行业展开激烈就业竞争,其结果:一方面大批传统工人阶级下岗失业;另一方面各大城市出台的农民工就业限制政策把农民工挡在许多行业之外。工人阶级内部的残酷竞争,使资本获得丰厚利润。各阶级利益矛盾因农民工阶级的出现而更为复杂,如何协调各阶级利益关系,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小农意识是小农经济条件下的个体农民意识,当农民工刚刚从

小农经济中分化出来与现代工业生产结合在一起时，传统与现代产生了对抗，小农意识与阶级意识形成尖锐的矛盾。一方面，小农意识作为对历史上专制统治阶级意识的依附，现在转变为对资本统治的依附；另一方面，农民工与农民不同，现代工业生产方式把农民工结为一个组织性、纪律性高度统一的阶级，在和资本统治互动过程中迫切要求形成阶级意识，小农意识在延续了两千多年后终于开始了其瓦解的过程。联想到小农意识对塑造中国国民性的巨大作用，这个姗姗迟来的瓦解是多么令人激动。

农民工是末代农民。如果说一部中国史就是农民改朝换代史，那么，农民工的出现将为农民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指明了道路和方向，因而将彻底结束朝代更迭的兴亡周期率。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将因农民工而改写。

农民局限于小块土地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狭小的空间使农民几乎成为“植物人”。农民工一出现就彻底突破小块土地的狭小空间限制，把整个世界作为自己活动的舞台。作为“世界工厂”工人的农民工把欧美的设备、澳洲的原料、中东的能源、日本的技术统统置于自己劳动范围内，又将新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农民工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使“世界工厂”不得不重新考虑选址的问题。

农民工是中国农民发展的最高阶段。农民工的出现，具有结束两千多年农民史的深远意义，具有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全球意义。其所带来的巨大作用和诸多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不论是学者还是政治家都希望了解和认识农民工的前身、成因、类型，了解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和作用、政治影响和前途、传统意识和阶级意识，了解这个阶级同其他阶级的关系与发展趋势。尤其是“民工潮”、农民工工资拖欠、“民工荒”引发的热点问题，更是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但这些热点问题还仅是农民工巨大冰山之一角，对农民工的系统研究还远未展开。即使是初步的研究，绝大多数是社会学和发展经济学性质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本上被忽略了。

政治经济学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如果自严复译《原富》算起，有一个世纪了。20 世纪上半叶基本上译介外国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翻译，特别是《资本论》的翻译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先是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被奉为圭臬，整个李嘉图学派之后的西方经济学一律以庸俗经济学对待，只作批判而不作研究。随着改革开放，西方经济学被大量译介到中国，逐步在大学课堂占居重要地位，任何一本美国经济学原著或译著在中国都有绝好的销路，而苏联政治经济学则被视为教条主义的代名词。这种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使经济学界自身的成熟性充分暴露。苏联与美国的经济学对于提示其本国经济矛盾自然是有道理的，却未必适合中国的经济矛盾。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学家都是外国经济学教授的小学生，中国经济学没有结束需要别人搀扶才能走路的时代。

进入 21 世纪，中国经济学在走自己的路上取得了可贵的成就，《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① 的出版，标志着中国人不再依傍外国某派经济学，而是独立地从中国现实经济矛盾出发去确立主体、分析矛盾、规定概念、建立体系。本课题研究依照中国政治经济学确立的主体、主义和方法对中国农民工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一方面对于推动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经济学内容的丰富和体系的完善不无价值。

农民工问题的复杂性为检验中国经济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提供了绝好的试验场，同时又为丰富中国经济学提供了素材。在农民工阶级那里，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农民与工人的矛盾、农业收入与工资收入的矛盾、小农意识与阶级意识的矛盾、国内与国际的矛盾汇集一身。如何认识这些矛盾，如何把握这

① 该书由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4 年 3 月出版，是刘永佶教授的代表作，也是他的中国经济矛盾四书中的最后一部总结性的著作。

些矛盾的层次和矛盾体系，如何根据这些不同矛盾规定政治经济学概念，如何从这些矛盾运动的趋势中把握经济规律并预测下一步的发展，都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也是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于推动农民工问题的最终解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当说，农民工问题首先是个经济学问题。农民工是中国劳动者从农民向雇佣工人发展的一种过渡形式。劳动者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政治经济学是特定阶级对经济矛盾的理论规定，也可以说是揭示与论证经济学矛盾的科学。”“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对经济矛盾的研究，实则是对一个社会群体的代表的研究，是代表一个社会群体表达其经济利益和意识，并由此来规定经济矛盾的。”“研究者及其所代表的社会群体是研究的主体，经济矛盾作为研究对象是包括研究主体在内的经济利益关系。”^① 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所确立的主体就是农民工阶级本身。这种研究要站在农民工立场上表达农民工的经济利益和意识，并由此来规定经济矛盾，探求依照劳动者，在此就是依照农民工利益解决矛盾的途径。遗憾的是，对于农民工的研究，政治经济学远远落后于社会学。

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于廓清在农民工问题上的错误认识，主要是西方发展经济学的错误认识同样具有理论意义。发展经济学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结束后发展起来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二战以前，世界处于殖民体系统治之下，先进工业国是落后国家的宗主国，而落后国家是宗主国的殖民地、附属国。在殖民体系时代，发达国家依靠赤裸裸的殖民统治建立与落后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二战后，殖民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瓦解，昔日殖民地附属国纷纷脱离宗主国而实现独立，在政治上成为“新兴独立的民族国家”，在经济上成为“发展

① 同上引书，第2~4页。

中国”。为了巩固本民族在政治上的独立地位，发展中国家把发展本民族经济作为深化独立运动的选择。在此形势下，发达国家如何同政治上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打交道成了新问题，发展经济学就是应这一需要而产生的。发展经济学作为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的一个分枝，在拜物教意识支配下，把发展理解为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转变的途径是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吸纳到工业部门。劳动者的劳动力被发展经济学当成一种资源，和其他物质资源一样是被配置的；而吸纳的主体是资本，为了保证资本“愿意”吸纳，就要满足资本对利润的需要。发展经济学还把当代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发展道路作为今天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任务的“模式”加以遵从，所谓“发展”本质上是向发达国家看齐。

战后产生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本民族经济，如何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成了它们共同面临的问题。它们所能借鉴的的确也只有发达国家早期的经验。但实践证明，发达国家早期发展的经验成形于特定的国内、国际条件：如雄厚的原始资本积累、全球尚未开拓的资源与市场、本国和世界各国廉价劳动力、世界范围的农业作为少数先进工业国的基础、无需应对外来侵略的压力等等。而这些条件在战后发展中国家普遍不存在。盲目照搬发展经济学的“模式”给发展国造成了巨大损失，不是陷于农业衰落，工业发展停滞，就是经济结构进一步走向单一。有的发展国竟依赖一两种资源产业构成整个国民经济，经济结构的脆弱性注定为新殖民主义推行创造了条件。由于这种政策的失败，发展中国家农民向工人转变的过程远未完成，劳动者的发展包括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都未能得到相应提高。还有的国家，由于城乡差距拉大，又没有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结果在城市形成大量贫民，农民向工人转变的过程同样没有完成。在经历了这一沉痛教训以后，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开始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同样面临发展问题，劳动者如何从农民转变为工人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一环。中国在这一阶段开始引

进发展经济学，但受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国情限制，发展经济学危害在现实层面还不大，但在理论上形成了许多混乱认识。例如，发展经济学把劳动者仅当一种资源配置，这种配置的主体当然是资本，资本雇佣劳动被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的动力源于城市现代部门追求利润的动机；而城市资本所以能吸引农民，在于城市收入比农村收入高，形成一种“峭壁”。实际情况是，中国经济发展以人为本，人不是资源，更不能像物一样被资本力量随意配置；中国经济发展的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劳动者的发展；发展的动力不是来自对物的追求，而是来自人自身发展的需要，不是资本“吸纳”人，而是人“引进”资本。工资收入与农业收入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二者差距不是“峭壁”而是“沙滩”。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农民工作为中国劳动者发展的独特形式显露出发展的国度性特征。对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学考察，可以消除发展经济带来的许多认识上的误区。

二

劳动者从农民向雇佣工人的发展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都要解决的共同性课题，但是农民工是中国劳动者在这一发展中所产生的特殊过渡形式。所以，严格地讲本课题国外并没有开展专门研究，相反，农民工自20世纪80年代产生后正值中国经济学活跃期，对农民工各种具体问题的研究文献非常多。这里对有关文献作一综述。国外文献我们将从与农民工对比的意义上进行介绍，毕竟特殊中包含着一般。

(1) 农民工的产生原因

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和城市是各国普遍现象。农民工虽然作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殊形式，但在为什么会离开土地从事非农产业活动这个问题上与各国具有共同性。发展经济学关注的中心问题正在于此，我们从刘易斯模型开始。

与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以及激进学派的“中心”与“外围”、支配与依附关系理论相比，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可以说是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发展经济学关于结构变动模式研究古典学派的代表。刘易斯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不发达国家利用什么样的经济机制才能使国民经济结构从以仅能糊口的传统农业为主的社会转变为现代化、城市化、多样化的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威廉·刘易斯由于这一项研究而获诺贝尔奖，他的“二元结构理论”后来经耶鲁大学的费景汉和拉尼斯等人的发展，被称为“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式”。该模式被西方学者认为是解释第三世界劳动力剩余国家发展过程的“普遍真理”，至今仍有不少人拥护。

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①一文中，刘易斯首先提出了他的“二元结构理论”的三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把不发达经济区分为两个部门，即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现代化部门和农村中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传统部门。前者生产动机是谋利，后者是为了自己消费。第二个前提是劳动无限供给。不发达地区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相比，多到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数，这就是存在劳动力相对过剩。这个条件规定得太过严格，其实只要劳动边际生产率低于工资（而不必非要为零或负数）即有劳动力剩余。第三个条件是工资水平不变，只要农业剩余劳动力没有被城市吸收完，工业部门的工资就会保持不变。

刘易斯认为，在不发达经济的两个部门中，只有现代化的城市工业部门是增长的主导部门，农村中的传统农业只是被动地起作用。工业部门增长的动力来自资本积累，资本积累来自利润的再投资，利润又来自对剩余劳动的有效利用。他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由于工业资本不多，无力吸纳全部剩余劳

^① A. W. Lewis, "Economics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In A. N. Agarwala and S. P. Singh, eds, "The Economic of Under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400~449.